

一个人远去的背影

——一个县委书记的人生片段

□安黎

作者按:杨尚坤

曾任耀县县委书记,他离开这个世界已经十几年了。他虽然撒手人寰,但却活在不少耀县百姓的心中,也活在我的心中。十几年来,我一直想用笔记他人生的点点滴滴,却因为想写的内容太多而变得无处下手。而今,我打算写一则长文,以对他进行多侧面的描述。本文仅为整个长文的一部分,其他的则陆续写出并贴出。杨尚坤离开这个世界时没有给儿女留下太多的遗产,甚至活得寒酸而贫穷,但一个人活到了让千万人敬仰的程度,也算得上人生的一大成功。

1

我要写的人物叫杨尚坤,和时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的名字读音相同,只一字之别。

第一次见到杨尚坤,是在陕西耀县中学的会议室里。那是1987年,我正站立在这所中学的讲台上,给高中学生讲授语文。某一天,校长把全体教职工召集到一个会议室,宣称县长杨尚坤要来看望大家。校长话音刚落,杨尚坤就独自一人走了进来。他没有带秘书,也没有那种经常能够目睹到的前呼后拥。会议室没有主席台,他就很随意地坐在一把长条木椅上,取下夹在腋窝的黑皮包,把它放到面前的条形桌子上。

教师们围着条形桌而坐,大家都在盯着他看,我自然也不例外。他大概四十六七岁,穿着一身浅灰色的中山装。不胖不瘦,但脸似乎有点肿胀。他的眼睛有着显著的特征:一只眼睛迥然豁亮,另一只眼睛却半睁半闭,模糊成一团——后来我才知道,他害过眼疾,导致右眼几近失明。

没有太多的客套话,他很快就进入了主题。他讲话没有拿底稿,侃侃而谈,但仔细聆听,却发现他之所讲,非常有条理,非常有逻辑性。他在讲教育对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意义,他在讲自己如何如何对教师充满敬意,当然也讲到了自己也曾为教师中的一员。他语调诚恳,没有虚话和套话,句句都像铁锤砸在铁砧那么结实。他每讲三四分钟,都会被掌声打断。教师们宛若过节一般,人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喜悦。没有人暗示或引领他们鼓掌,但他们,包括我自己,个个都恨不能把巴掌拍烂。一个小时的讲话,却有二三十次掌声,而且掌声都是自发的,这在我迄今四十余年的人生遭遇里,绝无仅有。

杨尚坤离去后很长一段时间里,他都是校园里热议的中心话题。大家本来已经耳闻耀县来了一位不错的县长,亲眼目睹,自然名不虚传。有好事者多方打探,搞清了他的来历,让我窥探到了他背后近乎黑色幽默的人生传奇。他出生于宜君县(曾归延安管辖,后划归铜川);原为一教师,因写文章有犯上言论,被打成右派;平反后因群众威望高,被提拔为宜君县教育局副局长;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一度也摸索着进行选举,且是差额选举,他被组织安排,做县长候选人的陪衬。以中国的国情,差额选举其实与等额选举无异,只是多了一个陪衬人。陪衬人如同聋子的耳朵,只是一个摆设。但杨尚坤这个聋子的耳朵,却被弄巧成拙,变成了一只真正的耳朵。也就是说,选举的结果令所有人都瞠目结舌:陪衬人被选上了,而内定的县长却被选掉了。

但杨尚坤并没有做宜君县的县长,而是被组织调配,当了铜川市农业局局长。铜川农业局的人,一说起他,个个都感慨连连,个个都在竖大拇指。我一位朋友的妹妹因车祸受伤,肇事车辆为杨尚坤下属单位所拥有。朋友一讲起杨尚坤处理这起事件的经过,激动不已。他说杨尚坤不但痛快足额地支付了伤者的医疗费用,而且三次去他那偏僻的山村,看望他的老父亲。除了给他的老父亲送上各种营养品之外,还有一个劲儿弯腰低头,向他的老父亲诚恳道歉。

说来有点好笑。我第二次见到杨尚坤,却是去向他告状——现在想起来当然觉得幼稚得可笑——在学校里,我自认为受到了不公正对待,于是在一个老师的建议下,去政府大楼找杨县长。给我出主意的老师说,杨县长很正直,且爱打抱不平,许多农民遭受了盘剥和羞辱,若找到他,他都拍案而起,立刻唤来基层官员问责。

有这样的传闻给我撑腰,我才敢朝县政府大楼走去。杨尚坤的办公室就在三楼的入口处,门正对着楼梯——这当然也打破了惯例。一般是级别越高的领导的办公室越靠里,但他却执意要选择楼梯口的办公室作为自己的办公室,据说就是让群众找他更方便——走到三楼楼梯的拐角处,我看见杨尚坤的房门大开着,屋里屋外都站着人。刚刚是下午上班时间,似乎有什么事情让他不满意,因此他显得有点小恼怒。听他和别人交谈,似乎是在联系车辆,我意识到他马上要下乡去。我慌忙走到他跟前,自报家门,但他却没有耐心听我详细叙述。他表情沉郁,摆摆手,让我去找主管教育的副县长。

我从他的门里出来,心情极度低落。别人为他编织的光环,曾经在我的心里闪耀。可自从见了他之后,那道光环,一下子就黯然熄灭。

2

第三次和他建立联系之时,我和他的

工作场地上都有所变化。他继续走高,从县长升为县委书记;我却从县城之内沦落于县城之外,在位于乡村某面坡半山腰的县委党校落脚。

某一天,党校校长跑来叮咛我,让我某日一定一定不要离开党校,因为他接到了县委书记杨尚坤专门打来的电话:杨尚坤书记要专程来党校看望我。

我心淡然漠然,对校长传递的消息,既没有诚惶诚恐,也没有受宠若惊,一点儿都不在乎。但校长却似热锅上的蚂蚁,坐也坐不住,站也站不稳,他脸上的肌肉扭动着,让人分辨不出他是在哭还是在笑。平日里见了我头颅高昂的校长,忽然就一脸谄媚,他放低喉咙颂扬起了我,把我吹捧得仿佛战国时期的屈原,民国时期的鲁迅。

我当然知道一个堂堂的县委书记,为什么要专程拜访一位平凡的教师——这无疑与《陕西日报》的一篇报道有关。《陕西日报》刊登的题为《山村里的年轻人》的文章,被杨尚坤看到,他便有了见一见文中主人公的想法。主人公呢,不是我,正是我。

那天的杨尚坤,带了一队人马来党校,其中有县组织部长、县人事局长、县宣传部部长等。十几个人,把校长的办公室挤得满满当当。走进校长的房间,就像电视里播放的国家领导人会见外宾那样,我与杨尚坤,分坐在两个单人沙发上交谈,其他人则围拢在四周,都在冲着我们很甜蜜地微笑。

杨尚坤简略地询问了我的一些情况,比如写过什么,发表过些什么,还有什么样的写作计划等等。

其中的一句话意味深长,被他重复了好几遍:你不想为耀县人民出点力?我告诉杨尚坤,我是吃着耀县的饭、喝着耀县的水、呼吸着耀县的空气长大的,尽管我有时候在冲着它发牢骚,但爱之切切,骨子里,我却在深爱着这片土地,我当然愿意为它抛洒自己的热血。

一番交谈之后,杨尚坤就打算告辞。在院子里,他故意落在人群的后边,肩并肩地和我走在一起。在没有别人,仅有我俩的情况下,他又把刚才说过的话反复了两遍:你仔细想一想,看能不能为耀县人民出点力?

就在我与他道别之际,他握着我的手,说今天人太多,有些话不好当众讲,于是叮嘱我什么时候去他的办公室,他要单独而深入地与我聊一聊。

我全然不知道,杨尚坤是一个一言九鼎之人。我以为他让我去他的办公室,不过是一句脱口而出的客套话——多少人在酒桌上抱着你喊兄弟,拍着胸脯要给你办这事办那事,可第二天在路上相逢,他却装作不认识你——于是可以想象,我一个县委书记的话,竟然当成了耳旁风。

几个月过去了,我的脚没有再跨进县委的门槛。但杨书记的疑惑,却通过不同人的嘴巴,屡屡飘进我的耳孔。那些传话的朋友或熟人告诉我,杨书记为我不去他那里颇为纳闷,他思忖自己是否有什么地方做错了,导致了对我有意见。我感到事态有点严重,于是选择了一个日子,去县委的办公室找他。

杨尚坤的办公室位于县委院子最里面的那栋小楼上,很普通,和一般工作人员办公室没有区别。我见了面,没有掏烟敬他,也没有用浮夸的语言恭维他。倒是他,给我倒了一杯水。坐在他面前的沙发上,望着他亲和的面孔,听着他诚挚的言语,我感觉他更像乡村庄里的某一个叔叔或伯伯。他感慨耀州的人杰地灵,涌现出孙思邈、柳公权、范宽等众多宗师,但现在却呈现着文化的荒芜。人才在哪里?他一遍遍地发问,似乎在问我,又似乎在问他自己。文化的沃土上长不出新苗,如何面对先祖,如何不愧对这片土地?作为一个外地人,仅仅来耀县为官,但耀县文化的衰落,却让他焦虑不堪。他紧皱的眉宇间,刻满了“痛心疾首”几个字。

杨尚坤在耀县为官,众人皆知他对教育、卫生与文化的重视。文化上,他盖起了全省县城罕有的壮观的文化大楼。但就是这栋楼,因为其建设的本意遭到歪曲,使他颇为伤感。他建楼的初衷,是要在楼里培植文化,培养人才,而今它却成了赚钱的舞厅。跳舞不是文化,只是娱乐,文化与娱乐有着根本的区别。对文化,杨尚坤有着自

己特别清醒的认识与理解。

杨尚坤之所以召唤我,以至于后来关照我,完全是因为他踏破铁鞋苦苦寻觅,终于发现了一个有着写作潜力的苗子。他不肯让这棵苗子中途枯萎,他不肯让这棵苗子永远匍匐在地。

当然,我很快理解了,他重复了又重复的那句话的含义。他询问我不能为耀县人民出点力,弦外之音是,他要发挥我的作用,让我除了自己写作,更要肩负起为更多写作者提供辅导的责任。我告诉他,演员没有舞台,其演技再好,也都会淹没在观众之中。我不图官,不图权,但得有一个施展拳脚的空间。

对于我,杨尚坤心里其实早已有了规划,他为我设计了两条路:一是去文化局当副局长,一是到宣传部做通讯员。到宣传部做通讯员,并非他的本意,而是宣传部长长的意思——我在党校的讲课赢得一片喝彩,那些来自各个单位的学员个个都成了鼓吹我的喇叭。那些学员,不是某局局长副局长,就是某乡镇的乡长书记,他们一方面在极度夸张地渲染着我的才华,一方面在为我凤凰落到鸡架上而打抱不平。他们纷纷叹息我这头老虎却被关在了牛圈里,效能没有得到充分地开掘和利用。如此,既是我本人的损失,更是耀县的损失。其中,有五六个学员曾向宣传部长推荐过我,向部长渲染了我的文笔如何如何了不得,宣传部长的心因此被烧红,于是他一趟趟去向杨尚坤要人,请求杨尚坤高抬贵手,把我调往宣传部。可惜的是,这些学员没搞明白,同样是操笔写作,



1990年5月杨尚坤在耀县第十二届人代会上作报告

文学写作和新闻写作是两条平行延伸的轨道,难以并拢与对接。

在文化局副局长和宣传部通讯干事之间,我选择了做通讯干事。我之所以如此选择,在于我曾从耀县中学调出时,首选的去向就是文化馆。尽管调动了各种力量,尽管浪费了各种人情,但文化馆的大门却怎么也叩不开,它依然紧紧地向我关闭。去党校,是无条件的无奈。如今,去给一个曾令自己不愉快的戏院家当副手,心理的别扭很容易演变成工作中的磕碰。况且,在县城建局当局长的岳父,极力反对我去文化局,他深谙官场游戏套路,很担心我成为一个老谋深算者的盘中餐。

杨尚坤接受了我的意见。他说他将来要给宣传部授权,让宣传部担当起全县文学创作的辅导之责,而我去搞新闻报导,等得到了授权,就专抓全县的文学创作。

我很快成了宣传部里的一员。刚到宣传部,杨尚坤专门和部长打了招呼,让他不要像要求别人那样要求我,尤其强调不要让我循规蹈矩地坐班。他说我也许晚上在熬夜,早上在睡觉,只要没有特别的事,就不要打扰我;部里若有什么材料要写,可以给我安排,但我可以在家里完成——这些都是部长告诉我的。部长当然得听命于县委书记,但他给我讲起这些的时候,语调里却蕴涵着隐忍的抱怨:大掌柜的(部长一贯称呼杨尚坤为大掌柜的)说得轻松,可部里就这几个人,八方拉扯,人手不够用,这个问题谁来解决?

我在宣传部呆了一年五个月。两次计划生育下乡,一次三个月,一次两个月。被《铜川日报》抽去当编辑三个月;被人大呼唤去搞选举三个月;到北京学习四个月。也就是说,既没有在家里坐过住,也没有在单位的办公室坐过住。杨尚坤的一片苦心,化为了云烟。

去北京学习,得到了杨尚坤的鼎力支持。在学习期间,我向他写了一封长信,既向他表达了感谢之意,又谈了自己在县委沦为当差者的郁闷,当然也提出了自己对耀县文化建设的构想:能不能成立耀县文联?

从北京一回来,部长就对我说:大掌柜的来宣传部好几次了,一再问你回来没有?大掌柜的让你一回来,立刻就去找他。

我当时就去了杨尚坤的办公室。杨尚坤说对我信中提出的建议很重视,考虑了很久,只是不清楚县上这一级,可不可以成立文联?我拿出我在北京学习的通讯录,一页页地翻着让他看。通讯录里,明白无误地记载着各个学员的来历,他们很多人就在县文联供职。杨尚坤很高兴,说别的县能成立文联,耀县更应该成立文联,因为耀县自古就文化底蕴深厚。

后来有一天,我在县委院子的路上与杨尚坤相遇,他告诉我,成立文联已经摆上县领导们的桌案,他和县长、县人大主任等私下里都交换过意见,大家都同意成立;元旦之前,常委会就研究决定这件事情。杨尚坤让我从心理上做好当文联主席的准备,最好拿出一整套文联工作的实施细则。

当时是十月中旬,可就在十一月,我突然听到一个消息,杨尚坤被调走,他要前往市上做市统战部副部长,并兼任市政协副主席。耀县是铜川分量最重的一个县,不论哪方面,都走在铜川各区县的前端,可就是这样一个县的县委书记,可就是这样一个人不论口碑与业绩都不错的官员,却几乎被空挂了起来。

这个时候,我不能不把杨尚坤与市委书记的吵架往一起联想。杨尚坤说他某一日发了脾气,指责市委书记太官僚,不懂得民间疾苦。他几乎拍起了市委书记的桌子,质问市委书记坐在空调房子里享

受着冬暖夏凉,可曾知道耀县照金山区的许多老百姓大冬天躺在光席上没被子盖?

杨尚坤离开了耀县,成立文联之事,自然就化为了泡影。

3

我和杨尚坤的点点滴滴,可能会让很多人如此猜测:杨尚坤对你如此关照,难怪你要写文追忆他。我可以告诉阅读我文章的朋友,帮助过我的人,数都数不清。对这些伸手援助我的人,我都心存感激,但并非每个人,我都能从骨子里对他滋生出一种发自肺腑的尊敬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,

全国刚刚兴起吃甲鱼热。每条甲鱼在高档饭店的标价是五百元——相当于现在的五千元——这个时候,就有身处官场的朋友,为了向我示好,便不畏昂贵,出手阔绰地请我吃它。说实话,当我知道了甲鱼的价格,我挺筷子的手就开始颤抖。吃完它,我心里没有任何荣耀之感,反而感到很伤悲。我想起了我的父亲,我想起了天下无数个匍匐在土地上如我父亲一样的父亲:他们的手上打着血泡,面色饥黄,劳作多少年,其收获才能与一条甲鱼的价值持平?

同样是吃饭,我在杨尚坤的家里吃过十几顿饭。并不是我嘴馋,蹭吃蹭喝,而是因于不同的理由,不吃不行。个别时候,我到他家里给他送材料,恰逢中午开饭,除了杨尚坤极力挽留外,他的妻子甚至动手拽住了我的胳膊。更多的时候,是他女儿女婿受岳父的委派,骑自行车追到我家,呼唤我去他岳父家。来了省城的文化人,或者来了省城的记者,总之,只要来了与文字有关的人员,杨尚坤都会叫我作陪。杨尚坤从不在饭店请人吃一顿饭,别人也休想在饭店里请他吃一回。他就餐,永远围着自家院子里的那个小石桌。外地来了人,他总是把他们带回自己家里,在那个小小石桌上犒劳他们。

我在这里列出一个县委书记家就餐的菜单,可能导致很多朋友不相信,但我要告诉心里有所疑惑的朋友:不论你是否相信,我说的都是真的,没有任何虚构。杨尚坤家的餐桌上,唱主角的有两道菜:一盘咸菜,一盘土豆丝。来客人了,两道菜才有可能丰盛成三道菜或四道菜,而新增加的两道菜,要么是一个西红柿炒鸡蛋,要么是一个炒豆芽。

有那么两三次,我和外地的客人已经在石桌旁就坐,杨尚坤迟迟不能前来——他几乎没有吃过一顿完整的饭,我在后面将对此进行叙述——等他坐到桌旁,瞪着眼睛看清楚桌上的那两样菜,面色不悦,轻声责怪起妻子来:来了客人也不知道加几道菜,老是咸菜咸菜?妻子不声不吭,转身回到灶房,不一会儿,一盘西红柿

炒鸡蛋就端上了桌案。西红柿炒鸡蛋,在他的家里,担当着名贵菜肴的角色。

很多次的中午,我陪客人坐在院子的石桌上吃饭,而杨尚坤却缺席着。他缺席的原因有两个:要么躺在床上打吊针,要么与来访的群众攀谈着,或者合二为一,坐在沙发上,一只手上插着针头,另一只手拽着一支笔,在歪歪斜斜地记录着群众的倾诉。但下午两点上班,他一点五十会准时出现在县委大院。吊针没打完,就先拔了针头,等晚上下班后接着再打。

杨尚坤的办公室,或者他家的大门,总是向所有人开放。任何人找他,都不会被他拒之门外。他家门外的小巷里,一到下班时间,就横七竖八地摆满了自行车、架子车、三轮车等等。那些衣着粗糙的工人,那些满身泥土的农民,那些遭受各种各样委屈的老百姓,常常在他家的大门里出出进进,在他家的院子里哭哭啼啼。时间久了,全县的人都耳闻杨尚坤如何如何亲民,那些原来还犹豫不前的胆怯之人,都鼓足勇气,纷至沓来。于是,他的家常都处于饱和状态,而他也就没有了片刻的宁静与休憩。他妻子对我讲过杨尚坤对她的要求何等苛刻:不能冷落任何一个找上门来的百姓;越是穿得烂的人,越要对他热情。杨尚坤如此劝慰自己苦不堪言的妻子:老百姓如果不是无奈,谁会跑那么远的路来找县委书记呀?他们到咱家来,心里本来就紧张,就忐忑不安,咱如果给人家一张冷脸,人家心里会是什么滋味?老百姓纳粮交税养官,不是让官当老爷的,是让官给他们解决难题的。

于是可以想见,任何一个人踏进他的家门,如果他不,他的妻子都会让座倒茶。他如果在,立刻就会被人围拢住。老百姓反映的问题五花八门:有反映自己失业家庭生活困难的,有反映土地被村干部霸占的,有反映打官司遭遇不公判决的,还有因为牛被小偷偷走而哭鼻子抹泪的等等。

听老百姓反映意见和问题,他习惯于用笔一条一条地记在自己的本子上。需要协调解决的,他告诉申诉者何时再来找他;有些能当场解决的,他抓起电话就给有关部门的领导打,让他们马上到他的办公室或他的家里来。他对老百姓永远和蔼可亲,但对官员却异常严厉。老百姓遭受了欺侮,仿佛受害者就是他杨尚坤,他的脸色都会变得青紫。见到那些不作为或乱作为的下属官员,冲着他们,劈头盖脸就是一顿厉声呵斥,责令他们不但要迅速解决老百姓的问题,而且要写出深刻的检讨。

我岳父是公路工程师,搞了半辈子工程,四十五六岁时,因为一阵子刮起重用知识分子的旋风,他因此而被提拔,成为官员中的一员。在杨尚坤主政耀县时期,岳父是县城建局局长。岳父告诉我,他这个城建局局长很难当,因为经常承受着杨尚坤的训斥,活得小心翼翼,如履薄冰。杨尚坤对街道的卫生异常重视,曾经的耀县街道,明净如洗,连一个瓜子皮都难以寻觅得到。但若有不自觉的市民往街道里乱扔了些许的垃圾,这些垃圾没有被环卫工人及时发现并清理,一旦被杨尚坤知道,等待我岳父的,就是一场逃不掉的责骂……在杨尚坤那里,岳父挨了不少骂,但他最敬重的领导却不是别人,而是杨尚坤。岳父经常给我讲的一句话是:杨尚坤是一个有品格的人。有人格,算得上岳父对人最高的评价了。

4

杨尚坤住在县上为县级领导修建的住宅里,一直没有搬离过。那是一排连体楼房,坐北朝南,楼高二层,被分割成五个独家小院。从外往里数第二户,就是杨尚坤的家。那栋楼,在那个年月,显得相当不错,但用现在的眼光看它,它却无比寒酸。墙面上没有贴瓷砖,裸露的砖墙灰暗陈旧。杨尚坤住的房子,楼上两间半,楼下两间半。一间房与一间房相互独立,不是现在所谓的单元式。

一楼拐角最大的那间房,住着他自己的妻子。房子里没有任何装修,涂料粉刷的墙壁,水泥抹平的地面。房子的后半部分占着一张大床;床上铺一张粗布床单。前半部分,则是会客之所,一张办公桌临窗而立,一个老式卧铺倚墙而站。家里的摆设,实在简陋,唯一有点现代气息的,是一台十八英寸的彩色电视机和那个面包一般肿胀而笨重的沙发。当然,院子的水龙头旁,还站立着一台单缸洗衣机。家里连一台电扇也没有,酷暑天走进他家,就像走进一座烤箱。杨尚坤夫妇若看到客人燥热难耐,就会拿一把扇子递到客人手里。

也许有人会认为杨尚坤在做秀,但我知道,他不是那种善于演戏的人。他的本性决定了他所做的一切,都是那么地真实自然。他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,只有大女儿有工作。全家的花销,主要依赖于他和妻子的死工资。他不会接受他人一分钱的贿赂,更不会把权力转化成为个人谋取利益的工具,因此,日子过得紧巴巴,一点儿也不奇怪。

(下转四版)